

QIANHAIGUANCHAO

郭梓林
著

潜·海·观·潮

海风篇：旗动？风动？心动？

海浪篇：拍岸方显浪惊奇

海水篇：都说海水苦又咸

山西人民出

QIANHAIGUANCHAO

郭梓林 著

潜·海·观·潮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蒙莉莉
复 审:秦继华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海·观潮/郭梓林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1

ISBN 7-203-04815-2

I. 潜… II. 郭… III. 企业文化-随笔-文集
IV. 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005 号

潜海·观潮

郭梓林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5 字数: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

ISBN 7-203-04815-2

F·452 定价:19.00 元

序

市场规则的有效与有限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軾

继《商海拾贝》、《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一位民企经理人的思与说》、《一脚深，一脚浅》之后，梓林又将出版他的第五本书《潜海·观潮》。他在处理繁忙的日常企业领导事务的同时，还能在4年多的时间里接连出版5本书。这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讲都是不容易的。比较他的这5本书，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思考问题方面的进步，也能看出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他从一般的企业管理聚焦到企业文化，然后又结合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应用和拓展经济学一般概念的外延，并且灵活地用来解决企业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矛盾的化解，合作的推进，从而为企业、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梓林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成果，已经成为他所特有的品牌，他也因此成为当今我国最欢迎的企业家演讲者之一。

这些年来，梓林越来越感觉到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威力，也越来越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它。确实，基于交换和市场的经济学，包含着深刻的哲

理,它可以说是当今社会科学中内容最丰富的学科。它说明了人和人关系中可能的选择,比较了各种选择的结果,以及人们做出选择的一般规律和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它的一个最惊人的结论是:人是自利的。如果公平地处理每一个人的自利,不但不会造成社会冲突,反而会使这种自利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推动力。这对于传统观点而言,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这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根本看法和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自从亚当·斯密 200 多年前提出这个猜想以来,人们不断地证明它,或者试图推翻它。这个过程至今也没有结束。梓林作为一位在职的企业领导人,在将市场规则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以及理论思考方面所做的大量探索,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市场规则之有效是建立在一个单纯目标——财富的创造之上的。这个目标在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无疑是最重要的。然而它未必永远有效,而且即使在人类还被贫困所困扰的时候,它也并不是惟一的规则,因为,除了财富,人们还有别的追求。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的幸福感并不和财富的享受成正比。将单一的财富目标转变为更为根本的关注“人的快乐与幸福”的社会发展目标,已经展现出了新的视野、新的理论和新的应用。这一改变不论在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企业家所面临的微观层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人和人关系的原则。希望梓林能够进而思考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并拿出新的成果。

于北京海淀区五塔寺(真觉寺)

2003 年 9 月 12 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海风篇： 旗动？风动？心动？

- ☐ 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应该落地了〔 3 〕
- ☐ 制度的彷徨〔 10 〕
- ☐ 火爆的，就是便宜的〔 15 〕
- ☐ 电动汽车：“国家信息化”又欲大摆免费午餐？.....〔 22 〕
- ☐ 政府以正视听的成本〔 27 〕
- ☐ 透过这双思考的眼睛〔 30 〕
- ☐ 日本，雄狮身边的闹钟〔 40 〕
- ☐ “海归贬值”的思维误区〔 46 〕
- ☐ “麻烦”的经济学片想〔 49 〕
- ☐ “合作”的经济学断想〔 80 〕

海浪篇： 拍岸方显浪惊奇

- ☐ 何为歧途?〔 109 〕
 - ☐ 假如“胸无成竹”〔 112 〕
 - ☐ 揣在兜里的剪子.....〔 115 〕
 - ☐ 跳槽的机会成本.....〔 119 〕
 - ☐ 企业：“非典”来兮归去.....〔 123 〕
 - ☐ 非公有制经济：圈里圈外的叙说〔 127 〕
 - ☐ 由“富”而“贵”的指向〔 136 〕
 - ☐ 存在“企业宪法”吗?〔 140 〕
 - ☐ 文化——走在半道儿上的中关村.....〔 144 〕
 - ☐ 企业家的企业文化.....〔 155 〕
-

海水篇： 都说海水苦又咸

- ☐ 并非纯粹肚皮官司.....〔 189 〕

海风篇

旗动？风动？心动？

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应该落地了^①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感谢主持人给我 20 分钟来作这次演讲。现在已接近午餐时间。对于演讲者来说，最后一个上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人们大脑接受信息的边际成本增加，而边际收益却相应递减的情况下，想要来一点杨小凯式的“超边际革命”，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儿。而且，20 分钟能说什么？20 分钟之内又能说清楚什么？好在思想交流的基本条件，除了时间之外，还有一个是合适的语境，也就是语言环境。会议提供的大量文字材料已经形成了一种语境，一天半的报告会更强化了这个语境。所以，下面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1. 制度经济学应该走下高台。
2. 把握真实世界与建立模型同等重要。

^① 本文为作者在 2002 年 9 月 26 日参加在杭州举办的“中国制度经济学 2002 年年会”上的演讲。

3. 文化视角与经济学视角。

先讲第一个问题,制度经济学应该走下高台。

从这次年会的学术交流成果来看,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的确在成为某种“高科技”的东西。既然是“高科技”,最终还是要运用到现实中去,那就存在一个“落地”的问题。经济学家大多是学者,而学者是分工负责为社会提供思想的。我们都知道,思想只有在传播之后才会有价值,就像产品要变为商品才能实现价值一样,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至少是接触到了——才有意义。

作为一个思想家或者是学者,最根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不就是让自认为正确的思想能够尽可能地影响更多的人吗?不说流芳千古,至少能影响一个时代或这个时代的某个进程,能影响一批人,桃李满天下。我觉得这是潜藏在每一位思想家或学者们灵魂深处的一种意志,也是经济学家追求最大化利益中最重要的偏好。说到最大化,当然就要牵扯到一个约束条件的问题。昨天,在谈论“为什么要写那些人家看不懂的文章”的问题时,北京师范大学的杨晓维就说:只有这样的文章才能评职称啊,如果能给 50 万年薪,很多人就不会再去写这样的文章了。这个话是真话,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如果有 50 万年薪,他就有时间去写很多他愿意写的很有意义的文章。我想起汪丁丁,他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把学术作为志业还是谋生的手段,其区别在于对学问本身的批判精神。也正因为做学问还只是一部分学者的“谋生手段”,所以他们难免随行就市,只好在这个圈子里说这个圈子里的“行话”(当然,“行话”是需要的,它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降低圈内人的交流成本)。晓维是玩经济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讲“约束条件”,讲“激励作用”,真是一针见血(不过会后,我知道了,晓维其实不过是拿自己说事儿而已,免得得罪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经济学是个好东西,而且无处不在,即使用来分析经济学家自己的行为,也一点都不牵强。所以,我在一些场合喜欢把经济学比做是“重庆火锅”,无论牛、羊肉,还是青菜、豆腐,只要放在

火锅里面涮一下,吃起来就是好味道。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如果你也把它放到经济学的思维里面“涮”一下,味道也会大不相同。一件事儿,如果用平常的语言来叙述,给人感觉常常会一般化,但如果用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就让人觉得很开窍。经济学是一种智慧的结晶。盛洪所说的“经济学精神”是最高的境界。我和盛洪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经济学有七个层次:经济学概念、经济学常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表述技巧、经济学思维方式、经济学智慧、经济学精神。盛洪也同意做这种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之所以会被称做“帝国主义”,也是因为它可以成为“火锅”。但是,现在这个“火锅”架子太高了,普通老百姓够不到、吃不着,只好敬而远之,我觉得挺遗憾的。经济学的书没有管理学的书卖得好,经济学的论文集可能情况更糟,当然,这有各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一本好的经济学书卖个20万册、30万册,乃至50万册,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市场,又遇上了搞市场经济的时代,中国人需要经济学常识,中国人需要经济学智慧,中国人需要经济学精神。这又涉及前面我们说过的,尽管有各种约束条件,但不影响作为理性人的经济学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有把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传播出去的深切愿望,但问题是怎么去实现这个愿望。在我看来,办法至少有两个:一个方法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经济学家的话语体系,另一个是让经济学家的话语体系适合更多的人。这后一种办法就是要把“火锅”的架子放下来,应该有一批像茅老师这样的人,写生活中的经济学,如企业中的经济学、农村中的经济学、机关里面的经济学、街道里的经济学等等,用这样的一些文章,把经济学从高台上请下来,或者说在“高台”与“地面”之间架设一个“楼梯”,让更多的人知道经济学,热爱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既然是一种智慧,那么经济学家就有义务把经济学的“智慧之光”带给中国的老百姓,如此一来,经济学就一定能够得到普及和推广,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学家的地位也就能得到

到进一步的提升,而经济学也就落地了。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来做普及的工作,这里面也有一个分工的问题,阳春白雪还是要的,也就是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并举,不可偏废。但是,如果中国的所有经济学家都去与国际接轨,则大可不必。

另外,经济学要落地,我认为张五常的学术态度和周其仁的教学方法是值得提倡和推介的,也就是说,经济学要到真实世界中去“耍刀子”(我对经济学还有一个比喻,叫做“经济学是一把很好的刀子”),经济学不能搞成“黑板上的经济学”,也不能只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耍”,更不能解释不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只要把这把刀子磨得够快,又能找到准确的对象,就能“刀刀见血”,手到擒来,令人信服地解释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开启人们的智慧。当然,你不能拿刀子去砍石头,对付石头还是用榔头好,这也是一个分工问题,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向披靡,但有些问题还是用别的学科知识更“经济”。

所以,接下来我讲第二个问题:把握真实世界与建立模型同等重要。

有个文学概念,叫做“悲剧”。什么是悲剧呢?文学家把悲剧定义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当人们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发生冲突,出现了现实不可能的结果,就要伤心,就要流泪,作品的悲剧效果也就出来了。经济学的模型同样要反映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无论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是其他学科,好的理论既要符合历史的必然,也要符合逻辑的必然。这两天听了很多很好的报告,有些报告还用了大量的数学推导方法,试图解释生活中某种逻辑的必然。但是,这些高度抽象的理论怎么才能回到现实中去呢?怎么把智慧的东西变得更加实用一些呢?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与实践结合,即使再好的理论也有可能产生悲剧,产生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在建立美丽精巧的理论模型时,还应该努力地去

把握真实的世界。如果说文学家们编造出的悲剧还具有某种美学意义的话,经济学模型的悲剧却只能是一种“不经济”。

在人们目前所面对的真实世界当中,至少有三大特点应该引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的关注。首先,我们处在转型期,领导们尚在“摸着石头过河”,老百姓也就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预期不稳定,短期行为就成为了某种必然。昨天杨晓维看了我的文章后说:“你那种文章我不能写。第一,不能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第二,没有多少稿费;第三,写得再多也不能评职称。”杨晓维的这番话至少说明了一点:我们的学者们必须考虑很多现实问题,这就迫使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把数学公式写进去,把各种各样的字母写进去,把一大串外国人的名字写进去,把文章索引和注释写进去,把参考文献写进去。否则,人家就不承认你的学术地位。这倒真是一个困境。我问他为什么就不能考虑得更长远一点?他告诉我一句凯恩斯的名言:“在长期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死去。”既然如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急功近利也能找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前提是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变。于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也总是热衷于做“短、平、快”的项目,理由是政策要变,环境要变,似乎大家都没有了稳定的预期,只好急功近利,甚至认为急功近利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承认,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信用监督体制的建设没能及时跟上,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信用水平与发展水平不配套,从而造成交易成本上升,投资信用的回报不高。而交易成本上升的最终结果,是直接影响到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正像茅老师说过的:为什么在美国刷盘子可以一上午挣 20 美元,而在我们这里,干一天也拿不到 10 美元?我们的交易成本过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它将直接影响到单个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使得同样的劳动付出,就是刷不出同样的钱来。所以,我们在建立相关模型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不但处在经济发展期,而且是一个高速发展期,整个社会充满机会和机遇,同时也在形成一些全新的游戏规

则。从打破“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开始,中国的 GDP 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保持着平均 8% 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前几年去法国,当地的华人朋友就对我说,法国已经是一个稳态的社会,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发展机遇更多一些。我们都知道,8% 是个很大的比例,这个数值最终是要通过产权来体现的。现在,为国家所有的产权绝对比例相对减少,更多地变成个人或者集体所有,其原因一方面是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加大,另一方面是公务员和个体投资者收入增加。随着个人成功机遇的比率增加,人们期望把握机遇的冲动也比原来更强了。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并没有提出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为社会营造出了一种自由竞争的积极氛围。既然是竞争,那就像我们挤公共汽车一样,能者先上,或者说是谁能挤谁就先上。可上了车以后我们发现,那些挤不动的老人和孩子怎么办?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期,制度建设不但很重要,而且必须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新制度建立与人们急于成就事业的心态的相关度,以及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可能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在我们建立模型的时候,都不能不予以考虑。

第三个特点是,进入后中央经济时期。随着国家的权力下放,权利也在下放,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带来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此外,像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道德约束力的减弱、行为规范的差异,都给市场经济环境的演化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就像是乒乓球、羽毛球和足球运动员们同时进入足球场踢足球,如果乒乓球的规则、羽毛球的规则、足球场规则都起作用的话,必然造成一种混乱。再加上所谓的“西力东进”,人文关怀的失落,自由与孤独结伴而行……这一切都给我们重整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问题。而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需要制度的支撑,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文化支撑,否则制度就有可能变形,或者按经济学的说法,叫做“由于执行制度的成本过高,

导致制度本身失效”。

从以上三个特点来看,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人们需要一种稳定感,处于经济发展期中的人们需要一种成就感,处于后中央经济时期(或者文化转型期)中的人们要的是一种归宿感。而所谓的稳定感、成就感和归宿感到哪里去找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在建立制度模型的时候必须考虑的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我就简单讲几句。我认为,文化视角与经济学视角都是解释真实世界的重要视角。在通常情况下,文化视角有助于我们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真实的问题,经济学家完全应该借助文化视角来观察现实生活。管毅平(上海交通大学)的一篇讨论关于人的动机问题的文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就分析得很好。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个人的偏好与选择,不是经济学家们的模型能完全解释的。偏好是私己的一件事情,而选择也是一件私己的事情,对它们的剖析,必须借助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文化对人的约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约束,如果我们完全放弃文化的视角去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即使建立了很精美的数学模型,并把方程解得很好,但最终却会发现,很可能一开始就把方程列错了。我不知道现在高考做数学题的时候,如果方程列错了,但解得非常认真和完美,评卷老师是不是还能给学生几分。但是我知道,好的经济学文章,最重要的不是看它的模型建立得是否精美,而是要看有没有找准问题,以及有没有找到好的问题。

一个外行“闯”进了内行们聚集的会议,为了让听众在边际上实现收益的递增,于是说了一通另类的话,而我的真实用意其实在于:活跃一下气氛,并交几个朋友。

谢谢大家!

制度的彷徨

一个人的世界是不需要制度的。只是多加了一个人——多了一个夏娃，就有了婚姻制度。再往后，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就越来越复杂，一直到《汉穆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再到规则。

人之所以需要制度来约束，并非“人之初，性本恶”，而是上帝担心总有一天人的智慧会超过他，所以就让每个人生来都不一样，而且彼此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沟通，甚至于即使实现了部分的沟通，还会有人时不时地来他一下“机会主义”，搞出一些“道德风险”之类的事情。自从人们知道了这个秘密，知道了上帝居然悄悄地给人安装过这么个致命的“程序”，还极其狠心地销毁了“源代码”，于是愤懑之余，集体弄出了“制度”这么个怪玩艺儿。为了使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避免回到“野兽对野兽”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为制度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永无止境的烦恼：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人们要支付达成共识的成本、确定度量的成本、保证执